



写在亚洲边地

(上)

改变清华学子一生的大篷车课堂

李希光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写在亚洲边地(上)

改变清华学子一生的大篷车课堂



李希光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写在亚洲边地：全2册/李希光主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ISBN 978-7-302-39004-6

I. ①写… II. ①李…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5860号

责任编辑：纪海虹
装帧设计：甘 玮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刘海龙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者：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90mm×255mm 印张：93.75 插页：12 字 数：1989千字

版 次：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188.00元

产品编号：060228-01

序言一

清华大学校长 陈吉宁

南西伯利亚广阔的草原上，几只苍鹰在蓝天白云下舒展着宽大的翅膀自由自在地低空盘旋。夕阳给洁白的佛塔披上了一层淡淡的金晖。在草地上铺上两块布，学生席地围坐在65岁的敖德汀娜跟前，听这位藏传佛教信徒讲故事。她说：“你们能跟着老师来到遥远的图瓦，是最幸福的人。我的孙女跟你们一样大，她在俄罗斯城市读书，但她没有这样的旅行学习机会。你们要珍惜人生，不自大，不嫉妒，不抱怨，不撒谎，不说别人坏话。心胸要像草原那样宽广，能包容，能让就让，该退就退。”

这就是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开设的大篷车课堂。李希光带着学生去亚洲边地上课，一上就是15年。如果让一个教授带着学生去漠北在蒙古包或草原上课，跑一趟，满足一下好奇心，就够了。真没想到李希光不仅自己其乐融融地在那些“蛮荒之地”上课，他每年带去的学生也很快与当地的老乡融为一体。

眼前的这本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写在亚洲边地》，收录的作品是李希光从过去15年里上过他的大篷车课的500多名学生的作业里选出来的。书很厚重，但回想过去15年一个老师为500多名学生在野外上课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更是沉重的。

早在十多年前，李希光的“大篷车课堂”开设两年时，清华大学的老校长顾秉林专程到密云听李希光的教学示范课，并确定李希光主讲的“走在路上的叙事艺术”为清华首批新生研讨课。

李希光教授的“大篷车课堂”的教学理念是当前清华大学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所提倡和支持的。在中国步入世界强国的今天，清华大学的学生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胸怀去看世界、看自己的国家、看自己的周边邻居？中国发展从过去的融入世界到今后的引领世界，所需要的骨干人才，不仅要关心中国，也要关心世界；不仅要懂得中国，也要懂得全球；不仅要研究发达国家，也要关注发展中国家；要能够跨越自己的国籍和文化背景，站在整个世界的视角去观察和思考。“大篷车课堂”把学生带到“亚洲边地”有两层意义：一是中国中心看边地；二是边地中心看中国。究竟谁是谁的边疆和域外边地？这是让学生站在不同的位置去理解不同文化和民族的中心、边疆、边陲、边地、国家、世界和天下。

今天的学生在理想追求、价值观念、胸怀视野等方面面临严峻考验。像清华这样的大学要

培养的不是有一技之长的匠人，而是具有担当精神的未来社会引领者、开创者、建设者。因此，在工具性知识越来越多的当代社会，怎样培养具有非功利心的人，如何帮助学生掌握未来成长最重要的价值和能力，避免人生目标的功利化、庸俗化，是学校面临的又一个重大挑战。“大篷车课堂”把写作课搬到异乡、陌生的丝绸古道上去讲，这是在培育一种胸怀和价值。“大篷车课堂”上课的地点在历史上和现实中跟中国密切相关。在亚洲边地上课，会发现中国的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直接联系，从希腊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到阿拉伯文化，从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到基督教文化是如何与中国本土文化交流的。亚洲边地的大篷车课堂也是一种大视野审视和思考中国边疆重大问题的极佳观察点，从这里可以发现现实的丝绸之路国家与中国的密切关系。

很多老师停留在把传授知识作为课程教学的核心，忽视了学生的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甚至是只教书，不育人。同时我们的培养体系和环节不合理，学科交叉融合不够，师生互动太少，教学评价激励机制亟待改革。我们所要培养的学生，不能只贪图过舒舒服服的小日子，不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必须是有抱负、有思想、有远见、有担当的时代英才。广大教师必须承担起学生价值塑造的主要责任，通过“言传”和“身教”来感染学生，用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陶冶学生的情操。为此，我们的教师要利用每一个教学环节、创造一切机会加强与学生的接触和交流。过去15年里，李希光每年带着几十名学生，走出清华校园，乘火车、汽车，或是骑马、骑骆驼，步行，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采访上课。上课的地点在长城烽火台上、西北戈壁滩、草原佛塔下、漠北毡房里、贝加尔湖边的小木屋里。李希光刻意带领学生去这种宁静的、没有网络和电视的地方读书、思考和写作，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激发读书和写作的冲动。“大篷车课堂”让学生读到他们很少接触的中外名著，如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丘处机弟子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还有西方人写的《大博弈》，等等。

跟随“大篷车课堂”旅行时，学生们以两三人的小组为单位行动。白天，学生们在边远山村走动并与陌生人说话，他们不仅学习与外部社会开展文化交流，还学会在小组内持续地交换想法和经验。晚上，所有小组都回到营地之后（这个营地可能是一顶毡房、一间咖啡屋或者一家旅馆），整个班的人集合起来，汇报他们白天发现的一个个有趣的人或者故事。教师以旁观者和组织者的身份听取学生们的报告。他并不会做出任何评判，但是会用指导性的问题打断学生，来帮助他们找到故事的焦点，或是挖掘更多细节，或者形成一个更相关的写作主题。

在网络时代的今天，文科学生的写作貌似十分容易，通过关键词或相关词检索很容易地围绕一个主题，用一串串专业术语、一堆堆学术套话，堆砌起一篇万言书。但是，许多学生不会使用简洁、清晰和充满人性的语言文字，准确记录和直接描写人类的日常生活、文化历史和社会政治活动，而这种写作却是人文教育的根本。在丝绸之路上教采访写作不仅是写今天的故事，也是写明天的历史。什么是真实的新闻和历史？客观存在的原生态的、没有经过文字和图像加工的新闻和历史，是学生走到这些亚洲边地，亲眼看到的、亲身采访到的，没有经过大众媒体

和网络修饰和过滤的事实。“大篷车课堂”带着学生去没有听说过的地方，学生不带偏见地去采访，完全是好奇心激发的。学生在宁静的原野里采访、上课、写作，不仅能准确真实记录亲眼所见、亲耳所听，最关键的是，学生在学习一种善良的、有尊严的、有智慧的、微笑的、幽默的、有思考的、不冲动的原创写作。那是一种摆脱大众媒体和网络的肤浅、浮躁和暴戾的真诚写作。

我高兴地看到清华有李希光这样的教师，他不仅不知疲倦地带着一批又一批学生奔赴千里之外实地写作，大量批改作业，还有心地把15年来的学生作业积攒下来，编成这本书。我祝贺《写在亚洲边地》一书的出版，祝福大篷车课堂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走得更远、走得更宽。

2014年11月18日

于清华大学工字厅

序言二

Miles Young¹

人们有太多时候认为教育中最重要的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关于一个学科我能够教授或者学到“什么”，而不是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专业视野限制而放弃了宽广的大背景；因为刻板说教而放弃了提问精神；因为乏味的案头研究而放弃了让人兴奋的实际体验。新闻学与其他任何学科一样都面临着这些问题，而不言而喻的是，事情不该是这个样子。

由李希光教授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十几年来组织参与的独特课程“走在路上的叙事艺术”显示了回答“为什么”是多么重要，并且还要用一种有想象力的方式来回答。对一代代清华学子来说，“为什么”旅行已经变得与目的地是“什么”一样重要。

这些旅程中的某些时刻永远停驻在了我的脑海里：在拉萨一家酒馆（第六世达赖喇嘛曾经伪装成他人在那里痛饮）的屋顶上谈论好莱坞塑造的西藏形象为何抓住了理智的西方人的心及其后果；或者在伊尔库茨克大学围绕西伯利亚学者较为长远的、非二氧化碳驱动的气候变化观点进行辩论。

也有更加私人的时刻：趁学生们去采访朝圣者时我在一条西藏乞丐的长队末尾坐下休息，由于衣服比较破旧而意外地成为朝圣者施舍的对象；或者深夜沐浴着星光坐在贝加尔湖边，一边喝着伏特加一边听一名俄罗斯捕狼者讲述他在1979年“阿富汗战争”时的故事。

这些时刻可以帮助消除传统思想以及孕育这种思想的观念。这些时刻有助于文智（CQ）的形成，特别是对那些习惯性地认为只有智商（IQ）重要的学生来说。

2013年，我非常高兴地在斯里兰卡——我安了第二个家的地方——接待了一次大篷车课堂。学生们对他们拜访的这个国家的文化理解程度即使往好了说也是极为薄弱的，只基于非常少量的阅读和对“热带乐园”的程式化印象。转折点也许出现在克拉尼亚大学的 Jagath Weerasinghe 在我科伦坡的家中讲课时。他是一位艺术家、哲学家，还是一个“老顽童”。他描述了在斯里兰卡刚刚结束的毁灭性的内战，感动了所有的学生。“破碎的佛塔”是他一幅早期画作的名字，在当时饱受争议，但至少对此次大篷车而言，这个词汇变成了一个比喻，即由于对可见之物背后隐藏的含义缺乏真正的理解，而由此诞生的虚假、简单的幻象。

我认为自己十分幸运，这些年来能够和如此有才华的学生们共同进行身体和心灵上的旅行。对我来说，大篷车课堂中的对话往往会演变成持久、珍贵的友谊。

1 本文由王思扬翻译。

前言：亚洲边地的课堂 | 李希光 文 王思扬 译

摘要：

在这个充斥着大众媒体与社交媒体的社会，学生正在成为信息的被动接收者。本书作者创立的“大篷车课堂”旨在将学生的头脑当成身体上的肌肉一样进行锻炼。在这个媒介化社会中，学生被分为两种类型。人数多的那一类会对外来文化做出直观回应，并反映在他们的思维与写作上。他们容易看到表面上的东西，写的文章没有深度，写新闻更是太快、太冲动，不去花时间思考。只有少部分学生在亚洲边地旅行、接触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会有分析性的回应。这第二类人的思想有深度得多。作者训练学生用更理性的分析方式看待不同的文化与人类，用自己的双眼去观察生活在不同环境下的人们，摆脱大众媒体刻板成见的束缚去搜寻异国他乡的故事。

在过去的15年中，作者带着累计超过500名学生，用自己的双脚、双眼寻找真相，并用自己的思维去解构当代媒体和学界关于生活在亚洲边地上的人的“神话”。借用了古代商人和朝圣者的“大篷车”概念，作者与其友人杨明皓（Miles Young）共同指导这个“充满思想火花的大车店”。“亚洲边地的课堂”旨在通过去亚洲边地旅行、阅读并撰写其风土人情来鼓励跨文化对话。

“大篷车课堂”是一次共同的探索，是由好奇心驱使的开阔眼界的旅行，其目的在于拓展学生的视野并提高其写作能力。“大篷车课堂”用亲身体验的方式进行“慢新闻”的教学。无论是在“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犍陀罗文化圣地、俾路支斯坦、戈壁沙漠、楼兰古城，还是在西伯利亚铁路、乌苏里江、贝加尔湖、唐努乌梁海或是蒙古，学生们都需要花很长时间来阅读，并在写作前进行头脑风暴。学生们还需要采访各式各样的当地人，比如深入尼泊尔的草根人群中，采访生活在那里的革命运动领袖。

15年来“大篷车课堂”出征20余次，本书选编了其中14次并分为上、下册：“走向塞外和漠北的草原丝绸之路”“走向西域和藏区的佛教丝绸之路”。上册包括7处：荒原列车去漠北（2014年夏 蒙古）、远逝的唐努乌梁海（2012年夏 图瓦）、苏武牧羊的贝加尔湖（2008年夏 俄罗斯）、远征乌苏里江珍宝岛（2005年秋 黑龙

江)、塞北凤凰城(2005年春 北京)、长城脚下得胜堡(2004年秋 山西)、科尔沁的诱惑(2003年秋 内蒙古)。下册包括7处:穿越法显海上求法之路(2013年夏 斯里兰卡)、探访玄奘西天取经地(2012年春 巴基斯坦)、喜马拉雅无媒体生存(2010年夏 尼泊尔)、沿着古长城走丝绸之路(2009年夏 甘肃)、坐着火车找寻香巴拉(2007年春 西藏)、重走藏区红军雪山草地路(2002年夏 四川)、罗布泊里探楼兰(2000年夏 新疆、内蒙古、甘肃)。全书从学生千余篇纪实作品和采访手记中精选了这300多篇。

序 篇

一辆载着20名学生的大轿车开过一座狭窄的石桥,转弯驶进了一条土路。路时不时地被一些猴子或者孔雀堵住。它们或是停住,或是缓慢地从车前走过,以显示它们才是这座森林的主人。经过10个小时之后,我们在越来越茂密的热带丛林深处看见了一座巨大的白色佛塔,在夕阳的照射下闪耀着金光。“那就是无畏山了。”我们的司机说道。

我们下了车,脱了鞋,赤脚走在一条沙路上,接着转上一条用石头铺成的路,直至我们来到一尊巨大的白色石佛前。我点燃了香,一名学生则把一束白色的花献到佛像前。我们跪倒在地,不停地礼拜。1600年前,法显花了17年的时间,穿过沙漠、雪山、森林,渡过海洋,才终于来到斯里兰卡的无畏寺。他在这里研习了两年,并把大乘佛教的佛经带回中国,由此成为中国的第一名“留学生”。

冥想结束之后,我们离开无畏寺回到树林中。明亮的月色下,点缀着白色佛塔的森林是那样的静谧、美丽。大轿车上一片沉寂。“为什么大家都不说话?”我问道,“你们是还在冥想吗?”“我们饿了。”一名学生回答。时间已经到了晚上8点。“好吧,同学们,杨先生已经为我们准备了烧烤大餐,”我说道,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都欢呼了起来,“但是我们到那儿还需要3个小时的车程。”学生们又沉默了。一些学生开始在手机上记录日记。

过去的15年中,我把在亚洲边地的大篷车课堂教学当成自己的生命。大篷车追随着法显以及其他人的脚步行走在亚洲边地。我最好的朋友杨明皓先生为这门旅行研讨课提供了支持。而我第一次想到要开办一个行走在路上的课堂,是15年前与清华大学当时的校长王大中的一次会面。

那是1999年的一个夏夜。我在清华大学甲所的一间餐厅中坐着,周围环绕着茂密的灌木丛与古树。核科学家王大中院士在那里和校党委副书记胡显章请我吃饭。那天早上,王校长在校长办公会上决定聘任我为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主任。

“你认为一个好记者的标准是什么?”王校长问我。

我从包里拿出两本书：《找回中国昨日辉煌》和《梦幻尼雅》。“这两本书是我多次去亚洲内陆和边境的旅行日记。”我说，“我想让清华的新闻学生学习一种慢新闻，也就是说学生们要撰写和发表自己的作品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就像我的这些日记一样。”

“我将用一支笔、一个记事本和两本古书在清华开启一种全新的新闻教育，”我说道，“那两本古书是法显写在5世纪早期的《佛国记》和玄奘写于7世纪的《大唐西域记》。”

“你为什么选两本古书作为新闻系学生的指定读物？”王校长问。

“中文里的‘记者’这个词，‘记’是动词，‘者’是指人。记者就是记录的人，”我解释说，“如果我们读这些伟大的旅行者或者说‘记者’写的书，就能够更直接地掌握进行珍贵历史记录的基本要素。”

第一篇 亚洲内陆的旅行记者

机长宣布飞机需要临时降落时，我与坐在旁边的漂亮蒙古姑娘相谈正欢。“飞机快没有燃料了。”他说。

所有的蒙古乘客都开始用自己的语言大声跟乘务员讲话。“乘务员说我们从乌兰巴托起飞前机械师给飞机加的燃料不够支持这次长途飞行。”我身边的姑娘冷静地向我解释道。

几分钟后，这架苏联时代的螺旋桨式飞机在一条狭窄的、未修整过的土跑道上安全降落。这里是一个几个月前被苏联军队遗弃的旧军用机场。“苏联红军留下了几桶汽油，应该足够让我们飞到科布多。”机长试图让乘客平静下来。

加油期间我走下了飞机。广阔草原的另一边，我看到了一座古城废墟，高大的城墙裹在护城河中间。“那是什么？”我问道。“那是乌里雅苏台。”同机的一位蒙古外交部官员回答说。

乌里雅苏台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许多喜欢看清朝古装剧的中国人可能都听过。“你胆敢谋反，送你到乌里雅苏台。”我在一部关于雍正皇帝的电视剧中就听过这句话。

雍正帝1733年建造了乌里雅苏台作为军事要塞使用，并使之成为外蒙古的政治、商业与军事中心。从18世纪早期到20世纪早期，乌里雅苏台是外蒙古与西伯利亚南部最重要的军事要塞与最繁忙的买卖城。在其鼎盛时期，乌里雅苏台的要塞里曾驻扎3500人的中国军队，住着北平、天津和山西商人的买卖城包围着要塞。直到1911年外蒙古的贵族与宗教领导者以响应孙中山号召中国全部省份独立的名义，宣布从中国独立，成千上万的中国内地商人才被迫迁回内地。

乌里雅苏台是连接各个骆驼商队行进路线的十字路口。从其东部穿过杭爱山可以到达库伦（现在的乌兰巴托），西部穿过阿尔泰山脉到达新疆，东南部穿越戈壁沙漠通到北京，北部穿过

唐努山可以到达唐努乌梁海。

我 1992 年到科布多的这次旅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项目的一部分，名为“丝绸之路的整体研究：对话之路”。

1990 年夏天，我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青年学者，参加了 UNESCO 为期两年的丝绸之路考察。在世界著名的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艾哈迈德·哈桑·丹尼教授的带领下，我们考察了 4 条古丝绸之路：穿过中国西部的沙漠之路，从威尼斯到大阪的海上之路，位于苏联的草原之路以及位于蒙古的阿尔泰山路。我从西安出发，身上带着 3 台相机、500 卷胶卷、1 捆圆珠笔、1 打新笔记本以及 1 个老式的打字机。陕西省省长白清才在西安的西门为参与考察的每一位学者颁发了 1 张唐朝官方的护照复制品，表示我们是合法的西行者。

但是 1400 年前，玄奘去往印度时却是偷偷摸摸地从西安出发，因为当时唐太宗禁止国人出关。玄奘说服了玉门关的守卫才成功偷渡出国。在中亚和南亚旅行了 17 年之后，玄奘回到西安，撰写了《大唐西域记》。在这本 12 万字的书中，玄奘描写了中南亚的地理、交通、气候、商品、人民、语言、历史、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范围覆盖现在的新疆、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玄奘在书的开头写道：“我在这里叙述的从未被叙述过，并且和你们从前耳闻的有所不同。我的书记录了帕米尔高原之外的几乎所有地方。本书纯粹记录我所见到的，没有任何夸张或修饰。”

我不清楚玄奘是如何记录并保存下他的见闻的。在他的年代，并不存在可以随时随地记录的微博等工具。他一定有极好的记忆力。但是我并不相信自己的记忆。我随身携带记事本，现场记录下所有我看到、听到的有意义的细节，并保持写日记的习惯。现在，由于微博或微信等社交媒体的普及，似乎人人都在写日记，但是与玄奘的写作相比，现在大多数作家写微博更多的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偏见和愤怒，而不是记录历史。

第二篇 学习“慢新闻”的大篷车课堂

打开毡房的门，看到金色的阳光在图瓦共和国辽阔的草原上跳跃。明媚的晨光下，叶尼塞河在雪山脚下静静地流淌。这是我们抵达图瓦之后的第一个早晨，此前取得签证邀请花费了两年时间，路上则坐了 7 个小时的飞机加 12 个小时的汽车。

“起床了，你们这些懒虫。”我在营地挨个毡房敲门，不想让学生错过这么棒的照相机会。我背着自己新买的尼康相机独自走到叶尼塞河河畔。1 个小时之后我回到营地，所有毡房内仍没有起床的迹象。我推开了男生住的毡房的门。他们正躺在床上玩自己的苹果手机。

当今中国，许多人像我的学生们一样，习惯在床上看微信或微博。人们早上起床之后，没

有时间上厕所、刷牙、洗澡甚至穿衣服。人们一边揉着眼睛，一边把枕边的手机打开。一天的生活从浏览微信或微博开始。中国人已经把人类本性从孔子所说的“食色性也”变成了网聊。为了努力成为第一个知道新闻的人并把自己的口水第一时间粘到一条新闻或微博下面，很多中国人每4秒钟就低头看一眼手机。他们一天至少低头200次，包括吃饭时、坐地铁时、开车时、读书时、开会时、听讲座时、做按摩时甚至做爱时。“如果我的大夫告诉我，我只能再活一分钟了，我会再最后看一眼微博。”某人在他的微博里写道。

紧跟脸谱（Facebook）的脚步，微博和微信也傲慢地表现出“我们已经掌管了世界”的态度。要想在这个疯狂的媒体世界中生存下去，记者们似乎别无选择，只能通过热炒明星、性、丑闻、隐私和暴力事件来吸引眼球。中国记者和新闻教育者便是在这种媒体背景下进行报道和教学，也难怪关于“新闻正在死去”的讨论越来越多。评论家越来越怀疑新闻学能否作为深度学习与深度写作的一部分。

微博并没有掌管世界，微博最终会被一种慢新闻超越，这是一种有深度、有文化、教育性强、增长见闻、值得思考并且可读性强的新闻写作。

我运用自己在新闻领域学习、工作和教学的29年经验，在“慢新闻”的报道和写作方面进行了新生研讨课的试验——在亚洲边地的游牧路线或佛教旅行者路线上教学。老师与学生会在一个没有电视和网络，尚未被社交媒体过度渗透的地方采访1周。

在遥远、孤寂的亚洲边地开办为期1周的手工作坊期间，我让学生用亲自实践的方式学习中国古代的新闻写作艺术——“记”，即纯粹的描写与无偏见的记录，没有鼓动性的语言，没有意识形态标签，也没有隐藏的商业或政治议程。在踏上旅程之前，我会要求学生阅读一些经典的新闻式作品，如佛教旅行者法显于5世纪早期写的《佛国记》，以及玄奘于7世纪写的《大唐西域记》。在这些早期的新闻类作品中，学生会学习到新闻写作中最基本的要素——“记”。这些书不是历史的“第一稿”，而是作为历史的终稿为后人提供了珍贵的记录。举例来说，为了确保自己的记录精确，玄奘用他的步长来测量距离。在他17年跨越138个国家的旅行中，他测量的误差小于1英里（约1.61千米）。

法显和玄奘的写作是叙述性的旅行日记，即对其旅行经历的仔细记录，写作中包含丰富的地理与人文信息。他们用自己的一手观察来描写中亚与南亚，书中充满了不寻常的景象与生动的细节。如果翻译成现代汉语或者英语，这些文字绝不会枯燥无味，而是非常吸引人且容易阅读的。

2013年夏天，我带着20名学生沿着法显《佛国记》中的路线踏上旅程。书中详细描述了这条古代佛教朝圣路上沿途的地理、交通、气候、商品、人民、语言、历史、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通过将法显的记录与学生的旅行笔记相比较，作者让学生自己发现他们写作中的不足，以及观察、聆听上的问题。

与现代新闻强调批评一切、怀疑一切、轻蔑他人、侵犯隐私不同，在法显和玄奘诚实的写作中，法显和玄奘倡导同情心和慈悲心这种人类的普世价值。同情是好新闻的核心。新闻写作和新闻报道不是给人带来痛苦与摧毁他人平静的生活和幸福，而应该是摧毁他人的痛苦。好的新闻永远是在苦海中漂零的人的避难所。

第三篇 以实践为主的教学

大多数跟随我的大篷车课堂旅行的学生都是大学一年级的新生。在过去的学习中他们更多是被动地接受知识和死记硬背课本，大多数人是第一次体验这种实践式教学。跟随大篷车课堂旅行时，学生们会以两三人的小组为单位行动。白天，学生们在边远山村走动并与陌生人说话。他们不仅学习与外部社会开展文化交流，还学会在小组内持续地交换想法和经验。晚上，所有小组都回到营地之后，整个班的人都会集合，汇报他们白天发现的一个有趣的人或者故事。教师以提问的方式帮助他们找到故事的焦点，挖掘更多细节。

学生在大篷车课堂的学习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学徒”身份。学生与经验丰富的记者和从业者一起旅行、工作。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与伟大的巴基斯坦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哈桑·丹尼教授在丝绸之路之旅的两年中，我一直把自己当成他的徒弟。白天我观察他做田野调查，早上和晚上我都会帮助他搬运沉重的行李。我们一路在喀什、阿什哈巴德、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等地停留时，丹尼教授都会凭借自己对中亚历史的广泛了解，将那些有趣的、重要的、相关的故事讲给我听，勾起我的好奇心，并让我更加渴望阅读、学习和写作中亚的历史和故事。

许多年后，我带领着自己的学生行走在路上时，一直都以丹尼教授为榜样。当大篷车课堂停留在塔克西拉、阳关、罗布泊、楼兰、贝加尔湖、哈卡斯和图瓦等重要地点时，我的大篷车课堂就会停下车轮和脚步，在当地找一块草地、一顶蒙古包、一个古墓地、一座古城遗址，现场授课，尽我的力量激起学生对亚洲边地的阅读和写作的兴趣。

亚洲边地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课堂，也是新闻学教育的一间巨大的实验室。学生们阅读、讨论、听我讲课的地点不是在温暖的教室，而是在长城上、雪山上、蒙古包内、佛塔下、沙漠的水潭旁、白杨树的树荫下、集市的茶馆里或者博物馆的木乃伊旁边。

与学生一起旅行时，教师的职责就是激发学生对所有他们看到、听到的事物的好奇心。在学生记录这些有意义的画面、见过的人和听到的话的过程中，教师应该提供持续的指导来帮助他们。

在大篷车课堂上路之前，学生们必须完成所有关于他们要写作的地方的课前阅读。不过课前阅读对这些精通社交媒体的学生来说往往是一个问题。他们对人文历史、地理类的书籍读得

越来越少。但是，为了能够在采访中提出正确的问题，并在荒凉的亚洲边地写出具有人文关怀的故事，学生们别无选择，只能阅读大量的中外书籍。

教师必须跟随至少一组学生，并聆听他们的采访。如果学生问出了不合适的问题，教师应该即刻在现场提出正确的问题并纠正学生的错误。晚上回到营地之后，由教师负责组织及引导讨论。教师安静地聆听学生们汇报自己白天的发现和所得。在讨论结束之前，教师会帮助每一名学生确认一个故事的思路，作为学生们第二天进一步调查的主题。

第四篇 思想的大篷车

学生们登上从北京到拉萨的火车时，包里背着两份阅读材料：一个是《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作者是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还有一个是理查·基尔（Richard Gere）一条被禁的新闻报道。好莱坞最受欢迎的偶像之一理查·基尔说2006年7月世界屋脊铁路的开通“是迄今为止中国对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语言身份保护的最大威胁”¹。

《西藏七年》是海因里希·哈勒的个人传记。作者是“二战”期间的纳粹德国的间谍，从英国在印度设的战俘营地逃出后进入了西藏。杨明皓给了每个学生一本复印件，意在提供一些发人深省的阅读和共同的讨论话题。

虽然我警告学生不要在火车上读这些东西，但大多数学生都无视我的建议。“Miles 让我们每人写一篇读后感。我必须在火车上把书看完。”一名坐在窗边的学生说，手里捧着那本禁书。

在火车上，一名学生正在采访两位年轻的荷兰游客。他们正在看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写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Lost Horizon*）。作者受到美籍奥地利探险家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在云南和西藏边界旅行的启发，描写了飞机失事后迫降到香格里拉的故事。香格里拉被认为是喜马拉雅山区一处隐蔽的地方，是一片世外桃源、一片天堂。“中国为什么不让西藏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年轻的荷兰人愤怒地对学生们说。显然，这两位荷兰游客是西藏香格里拉神话的信徒。

有些学生正在阅读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的系列冒险书籍。赫定在他的冒险故事中对西藏作为天然屏障的叙述普及了关于香格里拉的概念。

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从中国中部沿着京藏铁路穿过青海戈壁、西藏草原和雪山冰川之后，我们来到了拉萨。

望着金色夕阳下的布达拉宫，学生们坐在八廓街街角的一家藏式餐厅屋顶上，离大昭寺约

1 Railroad to Perdition - The New York Times - Breaking News, <http://www.nytimes.com/2006/07/15/opinion/15gere.html>_br (accessed February 12, 2014).

有十分钟的步骤。喝过了热乎乎的酥油茶，吃过了牦牛肉和羊肉，学生们在西藏的第一节研讨课开始了，我将之形容为“与杨明皓在天堂的对话”。

杨明皓：“谁能回答，我为什么要让你们读那本书？那是一本比较奇特的阅读材料。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傅姚锋：“这本书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西藏的新视角。我们过去看到的西藏新闻报道和信息都是正面的，但我们不了解西藏负面的故事。这本书让我们了解到西藏负面的东西。”

杨明皓：“另一个视角？一个不同的视角？”

陈梦吉：“作者在西藏生活了七年。这本书包含了西藏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并没有只写正面的东西，比如西藏人民很友好。他也展示了许多负面的东西，例如极端的宗教信仰。”

杨明皓：“海伦，书中有什么让你感到很奇特吗？”

海伦：“这本书描写的是旧的西藏生活，跟现代生活非常不同。它很怀旧。”

杨明皓：“但是海伦，在你的读后感中，在你写得很不错的读后感中，你还说了更多的东西。你说了什么？”

海伦：“我感到作者在讨好贵族。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跟贵族交朋友和参加各种宴会上了。这就是我的结论。”

杨明皓：“这是一个很好的结论。这本书中有些东西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我为什么要给你们这本书？我想要锻炼你们的大脑，因为你们的大脑是一块肌肉，跟你们身体里其他的肌肉一样。你们的读后感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数量多一些，一类数量少一些。第一类读者我称作对书的‘直观反应’，与之相反的读者就是对书的批判性反应。第一类读者趋向于表面，比较肤浅。第二类读者就深入得多。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写文章太快了、太冲动，不花时间。如果用一种更具分析性的方式看待这本书，你们就会开始问问题：他的想法是从哪儿来的？他的角度是什么？真正的事实是什么？哪些事实比较有说服力，哪些又很荒诞？如果你怀疑某些事实，那么给出你自己的证据来反驳这些事实。如果你解构这本书，你实际上是开始解构外界关于西藏的一些神话。谁能告诉我神话的定义是什么？”

海伦：“它不基于科学事实。神话是你听说但没有亲见过的事情，是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事情。所以神话通常是对一些事情的解释，无法留下任何可以记录的证据。”

杨明皓：“关于香格里拉的神话在欧洲文明与思维中的影响力是非常强大的，香格里拉神话提供了情感和个体上的安宁。它为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文明中的人提供了希望，如果我们要度过安宁和纯净的一生，也许能够在拉萨或是其他地方找到更好的归宿。你们可以重新审视这个神话的前提，西藏过去是和平的吗？性别之间的竞争、传统本教与佛教之间的竞争，以及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之间的竞争一直都是存在的。理查·基尔相信达赖喇嘛的领导是乐善好施和开明的，但是你不能通过提出另一个神话来解构原先的神话。”

通过这次头脑锻炼之后，大多数学生同意理查·基尔对青藏铁路的批判与环境影响无关，而是来自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香格里拉神话。一些西方人对西藏存在误解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怀有敌意，而是因为西方在全球化的压力下需要保有梦想的需求。

第五篇 穿越帕米尔山区

飞机开始飞越帕米尔高原时已近午夜，我正在安静的机舱中阅读一本关于塔利班的书。突然，我看到机长带着刘沙沙和田嘉进入了驾驶舱。透过窗户，能看见积雪覆盖的喀喇昆仑山脉。一座巨大的冰川峡谷直耸入天，两侧的冰崖如墙壁般矗立着。看到我的两名女学生被机长带进驾驶舱内，不知是我的心脏还是飞机忽然颤了一下。15分钟后，两个女生脸上挂着大大的笑容走回了机舱。我拦住了经过我身边的沙沙问：“你们去哪里做什么？”“我们在驾驶员的座位上坐了坐。”她回答道。“你们不会是驾驶着飞机过山了吧？”“机长手把手教我们开飞机了。”我的大篷车课堂是第一次来到巴基斯坦，但那里的人民对我们的热情风险太高了。

窗外明亮的月光下，我看到了喜马拉雅山脉的第二高峰乔戈里峰（也称K2），坐落在新疆和巴基斯坦的吉尔吉特—伯尔蒂斯坦地区之间的边境上。几千年来，中国的佛教徒为了前往塔克西拉的佛学院在雪山中艰苦跋涉，中国的商人过了塔克西拉后，继续前往南部的阿拉伯海港口，将货物航运到西亚和非洲。为了让旅行者能够更容易的穿越帕米尔高原，中国1979年建设了全长1300公里的喀喇昆仑公路，连通了新疆的喀什与巴基斯坦的吉尔吉特。吉尔吉特—伯尔蒂斯坦与新疆本地的住民可以凭借一个特殊的通行证自由地往返于这条公路。在吉尔吉特与喀什之间的边境上每天都有一趟大巴班车。唐朝时期，法显和尚、玄奘和尚和高仙芝将军就是通过附近的瓦罕走廊前往阿富汗和印度的。

半小时后，我们的飞机安全地降落在伊斯兰堡。

第二天早上，满载30名中国学生的汽车离开伊斯兰堡前往北部山区的塔克西拉。手持步枪的保镖坐在在前面的敞篷车里为我们带路。狭窄的、尘土飞扬的路上车水马龙，色彩斑斓的卡车、拖拉机、马车、敞篷车和摩托车来回穿梭。两个蒙面的年轻穆斯林女性穿着黑色的袍子坐在一辆中国生产的“轻骑”牌机动三轮车的后座上。村民们在路边卖花、卖鱼。

塔克西拉位于中国、南亚以及中亚的交界处。在它的西边越过印度河就是阿富汗和中亚；在它的东边越过恒河就是印度东部；在它的北边是通向喀什的公路，在红其拉甫口岸的另一边就是新疆喀什和田。中国和巴基斯坦正在建设一条经过红其拉甫口岸的高速公路，并计划再修一条铁路，连接喀什和阿拉伯海的瓜达尔港。

2000年前，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来到这里时，塔克西拉是犍陀罗佛教文化的中心。希腊艺

术家开始将佛祖画成或是雕刻成希腊诸神的模样，至今仍影响着中国的佛教艺术。希腊风格的塔克西拉佛祖拥有卷曲的短发，看上去十分的人性化和安详，披在身上的袍子有优雅飘逸的褶皱。但是时至今日，长达十多年的阿富汗反恐战争已经完全摧毁了这座人类伟大文化遗产的旅游业，古老的城市塔克西拉已经处在灭顶的边缘。

我们到达塔克西拉时正在下雨。古寺庙遗址坐落的山头看不到任何佛教徒和游客，塔克西拉的佛教古城一片寂静。亚历山大大帝以及中国的佛教徒法显和玄奘都曾来过这里。蒙蒙细雨中，我点燃一支蜡烛，放在 26 号房间墙上的一个小祭台上。这间房间经巴基斯坦考古学家丹尼教授证实，是中国和尚玄奘 7 世纪在塔克西拉学习佛经的两年中居住的地方。玄奘旅行至塔克西拉和南亚的经历在 16 世纪被写成了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塔克西拉宏伟的寺庙和佛塔在小说中被誉为“西天”。“西天取经”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词，但我的大多数学生在来到塔克西拉之前并不知道西天到底在哪里。望着摇曳的烛光，30 名中国学生缓缓跪下，向中国最早的留学生表示敬意。

我将学生们领到一间宽敞的佛殿内，那里曾经是玄奘和他的同学的讲经堂。环坐在我周围的石板地上，学生们开始谈论他们对玄奘《大唐西域记》的感想。

大多数学生同意，在玄奘生活的年代，居住在塔克西拉的人民和居住在雪山以北的中国人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在一个佛像下，我们看到了几行佉卢文雕刻在基座上。

根据玄奘的记述，在回中国的路上，他穿过北部的雪山，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旁的和田稍作停留。玄奘发现和田人的语言符号以及造句的方式与印度北部的犍陀罗非常相似。传说中，阿育王将他在塔克西拉的敌人流放至雪山北部。被流放者将他们新建立的王国首都命名为和田，在梵文中的意思是大地乳房。

一直到 20 世纪早期，和田才被瑞典考古学家奥利尔·斯坦因（Aurel Stein）重新发现。20 多年前，由日本和尚小岛康誉资助的中日考古队伍在和田地区的尼雅发现了一座古墓，里面葬着一男一女两个白种人。男人背着一张弓、一个箭筒和一些金属箭头，身穿锦缎的衣服，上面有刺绣的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¹。女人戴着金耳环和一条玻璃珠项链，身边的漆盒里装着一把梳子、化妆品和针线包。

中国考古学家和斯坦因在尼雅发现的文物中，还包括刻着佉卢文的木简。佉卢文是犍陀罗地区的书写文字，在塔克西拉和其他地方被使用。这些佉卢文本简还让巴基斯坦人想起他们用来练习乌尔都语书写的木片。

在教科书中，中国学生能够读到唐朝与中亚的关系是多么紧密，但是他们缺乏关于这种联系的地理、历史等人文知识。直至大篷车课堂来到新疆、蒙古、巴基斯坦、图瓦和亚洲边地的

1 中日共同尼雅遗址学术调查报告书，1999，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